

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政治参与的 多样性及其现实作用

权新宇^{1,2}

(¹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²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甘肃 成县 742500)

[摘要] 结合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实,对乌里玛阶层进行政治参与的形式及现实作用进行探讨和阐述。

[关键词] 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政治参与;作用

[中图分类号] D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23(2008)05-0022-02

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①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利益阶层,代表着本阶层和部分穆斯林的政治诉求与现实利益,因此,自诞生以来,就具有政治参与的本质属性,并始终活跃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实中。其政治参与的本质属性,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生变化,而其政治参与的形式,却随着时代发展有了很大的改变。本文拟结合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实对乌里玛政治参与的形式及其现实作用进行探讨和阐述。

一、乌里玛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

由于在所在国家的政权结构中拥有不同的地位,中东各伊斯兰国家的乌里玛进行政治参与的形式体现出差异性和多样性,主要有如下三种形式:

(一)间接参与

在波斯湾地区,这种参与形式的代表是沙特。在沙特,乌里玛上层通过向沙特王室提出建议,间接影响政府当局的政治决策。在世俗共和制、君主立宪制国家里,乌里玛一般都依靠组建政党或利用舆论影响穆斯林大众,从而形成对当局的压力,间接对当局的政治决策产生影响。

(二)直接参与

在伊朗,什叶派乌里玛教士是国家的“监护人”,其最高精神领袖大阿亚图拉是国家的最高领袖,总统的任命和国家宪法的通过都要有大阿亚图拉的签署方可生效,他有权罢免总统和废除宪法中不符合伊斯兰传统的条款。例如,1982年,伊朗阿亚图拉哈兹阿里组织了一系列专家会议研究“监护”问题,经讨论后,专家认为,“教法学家是真主代理人的代理人,他的命令就是真主的命令”^[1]。

(三)破坏性参与

这种参与形式的社会基础是教士阶层,中下层民众,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其中教士所占的比重最大。他们彻底否定现存制度的合法性,企图代之以严格按照伊斯兰原则建立起来的宗教政治。同时,他们不愿通过合法

的渠道或理性的方法来实现政治参与,往往成立秘密组织或团体,用暗杀、绑架、破坏公共设施等恐怖主义手段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种政治参与造成的结果或是社会动乱,或是现代化进程延缓,或原有的政府被推翻,建立新的政治制度。

二、乌里玛政治参与的现实作用

(一)为执政当局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来源

总观中东历史的发展历程,无论统治者对乌里玛实行政治强制还是赋予他们政治参与的自由,乌里玛支持统治者,在中东伊斯兰国家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执政者需要乌里玛阶层为他们的统治提供合法性。

当然,乌里玛阶层并不是一诞生就具有这样的政治功能,在先知及其后四大哈里发时代,不存在乌里玛这一特殊阶层。原因在于:第一,在先知时代,没有人能取代先知的政治和宗教权威地位;第二,伊斯兰教强调人与神之间的直接沟通。直到8世纪奥斯曼帝国时代,乌里玛阶层才加入统治阶级的行列,但在当时受到帝国世俗王权的严格控制。尽管如此,帝国的世俗王权也要得到乌里玛的支持,如一名研究乌里玛在帝国现代化改革中的作用的学者指出:“帝国现代化改革所希望带来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里玛的态度。”这正说明了乌里玛阶层在当时的政治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俗化民族国家在中东纷纷建立,如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埃及等国。各国当局均推行政教分离政策,严格控制乌里玛参与政治。但无论是埃及的“中东雄狮”纳赛尔,萨达姆·侯赛因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政权,还是叙里亚阿萨德政府,均在和乌里玛的数次斗争中所获甚少,执政者最后都不得不借助于乌里玛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例如,纳赛尔极力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战略时,爱资哈尔大学大教长阿卜杜勒·哈利姆·穆罕默德写了《关于共产主义的费特瓦》(Fatawa'an- al-shuy'yya)一书,为官方政策作辩护。爱资哈尔大学一向被认为是保守乌里玛集团的大本营,历史上,穆罕默德·阿里曾经对它进

[收稿日期] 2008-03-12

[作者简介] 权新宇(1975-),男,甘肃两当县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助教,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东和中亚以及伊斯兰教史。

行过“世俗化改组”。当时对教长的任命,包括对最高宗教领袖的任命都是政府的特权。与伊朗的乌里玛制度(乌里玛在财政上是独立的)不同,埃及的乌里玛“是拿国家薪水的雇员”。譬如,1979年5月,爱资哈尔的乌里玛集团发布法特瓦(Fatawa)^①,认为“埃及—以色列和约是与伊斯兰法协调一致的,这个和约是出于圣战结束后,以及十月战争胜利后的有利地位才缔结的”。乌里玛们还从历史上找到了为埃以和约辩护的先例,那就是公元628年先知穆罕默德曾与当时麦加城的统治集团缔结了胡达比亚(Hudaybiyya)和约,从而为萨达特的政策提供了合法性。

(二) 维护现行政府政治统治的稳定

在波斯湾国家,无论是推行神权君主制的沙特,还是推行君主立宪制的约旦、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国家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乌里玛与君主的友好合作。

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大阿亚图拉霍梅尼推行其“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外交政策,大力向全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推翻波斯湾君主专制国家,这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治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下,1979年11月,圣城麦加发生了大清真寺被占事件,这个事件把反对派的反对政府运动推向了高潮。被占事件发生后,沙特政府立即调集军警包围大清真寺。与此同时,沙特国王请求乌里玛宗教权威机构拟订一封“费特瓦”。政府军在乌里玛的支持下镇压了叛乱,维护了沙特社会的稳定。正如约瑟夫·凯切奇安指出的那样,“乌里玛的权利和威望集中在神学阐释的技能方面,……十分清楚的是,在整个历史上,乌里玛的这种顾问作用,确也曾被政治领导层所忽视”。但事实证明,乌里玛在维护现行政府政治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视。

(三) 削弱现行政府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乌里玛既可以增强现行政府统治的合法性,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也可以削弱现行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增强与削弱,关键在于执政当局对伊斯兰的态度,以及现行政府的统治背离伊斯兰传统的程度。一旦现行政府当局远远背离了伊斯兰教的传统,为激进乌里玛阶层所不能容忍,那么,作为伊斯兰教的“捍卫者”——乌里玛阶层就要做出相应的回应,这个回应就是利用伊斯兰教的传统削弱现行政府统治的合法性。

1928年,在埃及诞生了第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这个激进组织强烈反对阿拉伯国家效法西方,提出净化 and 重振伊斯兰教,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泛阿拉伯帝国,为此,他们千方百计要推翻各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府。近一个世纪来,这个历史最久、分布遍及阿拉伯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一直与各国政府斗个不停,他们发动穆斯林大众反政府,不断制造爆炸、暗杀、暴动事件和政变,使各国政府焦头烂额。1948年穆斯林兄弟会暗杀了当时的埃及总理诺拉沙帕夏,1958年又企图暗杀纳赛尔未遂,后转入地下,沉寂了十余年。上一世纪末,大多数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政治态度转向了温和。

20世纪70年代末,伊斯兰原教旨运动再次掀起,并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1979年,原教旨主义者在伊朗推翻了推行现代化的巴列维国王,以革命手段建立了伊斯兰原教旨政权,事件震惊全球,也极大地鼓舞了中东各国的极端宗教组织革命夺权的热情。清真寺成了煽动和策划革命的大本营,与政府展开你死我活的较量。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穆斯林兄弟会的分部组织“赎罪与迁徙”暗杀,事后埃及著名大教长沙拉维在1981年11月指出:“如果真主同意他们的暗杀计划,那么没有任何力量,警察、军队能够阻

挡他们……他们的真实目的难道仅仅是想杀掉他吗?……他们所有行动的意图难道不是要夺取埃及的政权吗?”^[2]沙拉维教长可谓一语道破玄机,他不仅指出了穆斯林激进势力的真实意图,也道出了伊斯兰这种宗教所特有的性质,即伊斯兰是一种政治性的宗教,它不可能与现实政治尽脱干系。

再譬如,1998年,埃及银行和房地产部门向议会提交了一个关于银行贷款利息的法案,埃及艾兹哈尔大教长穆汗默德·塞仪德就埃及银行贷款利息问题发布了一道“费特瓦”,“称任何类型的贷款利息,除非是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不贷款不足以维持生命的情况下,贷款利息是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否则,则违背伊斯兰教法的,是被教法所禁止的”。结果,人民议会被迫暂时搁置了这一法案,并督促经济委员会再次考虑这个法案的宗教合法性。鉴于贷款户有可能拖欠贷款,从而可能导致银行和房地产部门陷入经济混乱,人民议会最终以这个法案不符合“沙里亚”(Sharia)^③宗教原则而暂缓了对这一立法的考虑。

三、结束语

“伊斯兰是具有双重功能的宗教:一方面作为宗教体系,它有净化灵魂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政治思想体系,它又具有改造社会的作用。它时刻向政治权力提出要求。它以自身强大的政治认同功能和合法性功能抗拒着现代社会的政治变革。”^[3]而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现实政治参与的代表之一,乌里玛阶层正是“双重功能”的体现者和向“政治权力提出要求”的现实代表之一,其政治参与既根植于伊斯兰古老传统,又随社会历史演进而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这主要体现在乌里玛既是现行伊斯兰国家政权的维护者,也是现行政权的“掘墓人”。随着以“世俗化”为前提的现代化进程陷入两难困境,当不能解决“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4],以及诸如失业、贫富差距扩大化等问题时,中东伊斯兰国家就会“回归”伊斯兰教的传统,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在考虑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等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仅站在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角度上,忽视中东伊斯兰国家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而一味追求西方式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等诸问题妥善解决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参与者乌里玛阶层。尤其在两极格局结束,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今天,在美式的“民主”和其“所谓的大中东计划”在中东引起政治混乱和社会无序的特殊情况下,强调古老的伊斯兰传统,强调乌里玛的政治参与,重视其现实政治作用,又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注 释]

①乌里玛(Ulama)一词在阿拉伯语中,通常泛指所有得到承认的,有权威性的穆斯林教法学家和神学家。

②法特瓦(Fatawa):教法学家通过独立判断对法律疑难问题发表的个人正式见解。

③沙里亚(al-Shariah),伊斯兰教法的专称。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通向水泉之路”。泛指“行为”“道路”,引申为应予遵循的“正道”“常道”,即指《古兰经》中所启示的、圣训中所明确解释的安拉诫命的总称,为每一个穆斯林必须遵行的宗教义务。

[参 考 文 献]

[1][美]赛义德·阿米尔·阿霍蒙德.什叶派的权威与政治文化[M].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8:197.

[2][美]翰尼斯·J·C·詹森.被遗忘的职责[M].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6:1.

[3]刘克华,东方晓.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毕德欣]